



逛故宫,已经是外地游客到北京之后的必选项。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,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,旧称紫禁城。如今,在大众的称谓里,已经鲜有“紫禁城”,而是以“故宫”代之。那么,“紫禁城”的称谓是何时被“故宫”取代的?

紫禁城的外宾接待处,由宦官导游并提供茶水服务,约摄于1901年夏。



从煤山远眺紫禁城(1901年)



# 紫禁城何时称“故宫”

## 《汉书》已有“故宫”一词

“故宫”一词,原意是指旧时的宫殿,但凡指称废旧的宫殿,俱可使用,并非专用名词,也并不一定寄托着深沉重重的寓意。“故宫”一词最早的应用,尚无从确考。不过,在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中有载:“公卿白议封禅事,而郡国皆豫治道,修缮故宫。”

借用这一词汇,自然可以带有一些王朝兴废、鼎革沧桑的意蕴。唐代杜牧有《隋宫春》一诗,就曾用到“故宫”一词来抒发对隋代亡国之因的感悟。诗云:“龙舟东下事成空,蔓草萋萋满故宫。亡国亡家为颜色,露桃犹自恨春风。”

应当说,杜牧此诗乃借前朝兴废之迹,抒鉴古察今之意,确有简明总结历史经验,发挥历史本身对后世的教化之用。那么,直接经历亡国之痛,眼睁睁看着本朝宫殿化作“故宫”,则更有切身入骨之痛。

宋徽宗就曾写有一阙,名为《宴山亭·北行见杏花》。这一词作写于1127年“靖康之变”的北宋王朝覆灭之际,乃是徽宗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金兵掳往北方途中,偶见杏花,托物感兴之作。词作中也提到“故宫”一词,有这么一句饱浸血泪的亡国之叹曰:“天遥地远,万水千山,知他故宫何处?”

至此之后,但凡借“故宫”一词来抒发情怀者,大多已跳不出兴废无常这个圈套了。唐宋已矣,元明更迭,至清代覆灭,帝制时代终结之后,“故宫”一词则逐渐脱离其原意与寓意,而成为专指北京明清两代皇宫之建筑遗产的一个专用名词。这一名词,随着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创建,经过公共文化空间里的近百年应用实践,几乎成为专有化名词。

那么,在“专名化”之前,即清廷于1912年初宣布退位之后,到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这段时间里,“故宫”一词是如何逐渐被人们用于专指明清两代皇宫,时人又是怎样应用这一词汇,是着重于原意,还是仍偏重于寓意之应用?

仅据笔者所见,自清廷颁布“退位”诏书以来,最早在公共文化领域把北京明清皇宫称为“故宫”的,可能源自《故宫漫载》一文。此文曾被沪上知名学者、报人胡怀琛辑入其编著的《清季野史》一书,于1913年4月印行。

《故宫漫载》一文,很容易让读者以为是一篇由一位作者写成的掌故体散文,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《故宫漫载》包含了《颐和园纪游》《颐和园赋》《望江南》《记圆明园》《记三海》5篇文章,除了首篇没有署名之外,其后四篇的作者署名分别为杨小欧、王佑退、钰题、餐英居士。

无论“故宫漫载”这一标题出自何人之手,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提出的“故宫”概念,或者说此组文章被统一冠名为“故宫”的场域,并没有包括今人更为熟悉的北京明清皇宫,即紫禁城。这一组文章所

## 《故宫漫载》谈“故宫”

记述的全部是“御苑”性质的所在,即皇家园林的处所。

前三篇俱写颐和园,后两篇分别写圆明园与“西苑三海”。所谓“西苑三海”,指北海、中海、南海,明清时期称为“西苑”。由此可见,时人心目中的故宫,或者说可以见到的故宫,还仅仅停留在能够游览到的“御苑”场域之内。须知,西苑三海为大内御苑,圆明园与颐和园为离宫御苑,即便时至清末,后两处御苑虽因历次焚掠而毁圮破败,仍可属皇家“禁地”之一,也并不能随便出入。

清帝逊位后,因《清室优待条例》的存在,前清皇室成员仍居住于宫内,紫禁城仍属禁地,民众不能进入游览。皇宫里仍生活着前朝皇室成员,还不能完全视之

为历史遗迹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即便如胡怀琛这样见多识广、敏锐博洽的学者,虽用“故宫”一词赋予北京明清皇宫以时代寓意,但承载这一词汇寓意的时空场所,还只能局限于御苑层面,无法深入到紫禁城之内。

《清季野史》出版前后,一大批披露所谓皇宫生活、皇室生活的报刊读物已然甚嚣尘上,风行一时。但在这些报刊文章与通俗读物中,对逊帝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皇宫的兴趣,对皇室生活的兴趣,更是远远超过皇宫遗迹。当然,1925年之前的逊帝与皇宫,仍属“禁地”,对读者而言,未知的确实吸引力更大。

这一时期,因《清室优待条例》的存在,对紫禁城的称呼出现多种。翻检这一时期的史料文献,“一官多表”的情形时有发生。

## 重大事件中的“故宫”

出乎笔者意料的是,最早发布在国内主流媒体之上,且还是以政府公文形式出现,可以视作指代紫禁城的“故宫”一词,竟然是以袁世凯的名义发表出来的。

时为1915年12月12日,正值袁世凯妄图称帝前夕。当时所谓的“全国国民代表大会”及“立法院”等,以群体“劝进”的方式,表示拥护袁氏称帝。为此,袁氏发布了一道“大总统申令”。12月16日,这一道“大总统申令”全文刊登在《时事新报》上,其中有段谈及“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,自无故宫禾黍之悲”。

辛亥革命之后,正式公文里使用到“故宫”一词的首例,极可能正是出于这份袁氏“申令”公文之中。严格说来,这份公文里的“故宫”一词乃是用其寓意,并没有以之直接指代紫禁城。这里使用的“故宫”一词寓有“故国”之意。

1916年3月3日,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的“诗选”栏目里,刊发了南社诗人叶楚伦所写《元年》组诗三首。其中第二首的末句有云:“只有昆明湖上月,姗姗犹作

故宫秋。”这里的“故宫”一词,因有“昆明湖”的提示,应当是指代包括颐和园在内的御苑。诗题《元年》,意即所谓“洪宪元年”,乃袁世凯称帝之后所创“年号”,显然有讥刺之意。

《元年》组诗发表仅仅二十天之后,袁氏宣布取消帝制。接下来的“讨袁”与“护国”运动势如破竹,袁氏猝亡。1918年7月12日,叶楚伦以主笔身份,再度出现于《民国日报》报端。当天第二版头条的“社论”一栏开篇有言:“张勋入北京,拥三千定武军。提溥仪出坐大殿,胡代衣冠,昙花一现……溥仪奄奄还居故宫,而喧天赫地之共和复活纪念成焉。”

此文提到的“故宫”,已然明确指代紫禁城,且为“内廷”部分,即溥仪仍暂居其中的区域。而紫禁城的“外朝”部分,即以“三大殿”为主体的场域,当时已辟为“古物陈列所”,已经对外开放,不再属于皇家禁地。

及至1924年11月5日,冯玉祥“逼宫”事件突发,溥仪及清室终于被迫搬离清宫“内廷”。值此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夕,公共文化场域对“故宫”一词的使用则更为频繁。“故宫”专指紫禁城的用法,也逐

渐形成。

譬如,就在1924年11月5日当天,在黄郛主持下的北洋政府国务院,向全国各大报刊发出了一份“公电”,主题为“清室优待条件修正”,主要内容是为“逼宫”事件做一番公开解释。这份“公电”开首一段写道:“各报馆均鉴:民国建国十有三年,清室仍居故宫,于原订优待条件第三条,迄未履行,致民国首都之中,存有皇帝之遗制,实于国体民情,多有抵牾。”

这通电文中的“故宫”,已是非常明确地直接指代紫禁城了。事后不久,1924年11月14日,《民国日报》刊发《清室之最后》一文,记述了已迁居醇王府暂住的溥仪的一段谈话。这段谈话,乃是回应当时前来问讯的鹿钟麟、张璧两人的。溥仪在谈话中说:“对于故宫善后事宜,自无不可商量者。”

在这一阶段,社会上已大量用“故宫”一词指代紫禁城。及至1925年10月10日,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,“故宫”一词的应用和其在公共文化场域的应用,也逐渐向着专名化方向发展。

据北京晚报